



富于哲思，长于议论
旨深趣远，情理兼得
众体兼备，平易畅达

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富于哲思，长于议论
旨深趣远，情理兼得
众体兼备，平易畅达

刘培著



北宋辞赋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辞赋研究/刘培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209-04845-3

I . 北… II . 刘… III . 赋—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 I207. 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064 号

责任编辑:张丽

装帧设计:张丽娜

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845-3

定 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

龚克昌

我时常听到一些人抱怨，古代文学这片园地已耕耘得差不多了，没有多少生荒可垦，也没有多少潜力可挖。这话从表面看有些道理，但细想却问题重重。其一是，某片园地——即某阶段文学或某些作家作品，的确被耕耘得相当精细——甚至可以说被折腾得不亦乐乎，因为人们在此几乎是扎堆操作——你写文学史，我写断代史；你写简注，我作评注、集注；你搞意译，我搞直译；你写论文，我搞简说……这点我们从任继愈先生多年前在《续修四库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即可约略体会到。他说：“近年来，我接触到了不少年轻学者（包括学生、教师及某些研究生导师），生活在书籍的海洋里，却沉不下心来读书。不读书而喜欢写书。才思敏捷的，一年之内写它三五本，毫不吃力，写得又多又快。现在信息方便，从网上下载，连缀成篇……”从“网上下载”云云，说好听是引用，说不好听就是抄袭，“不少青年学者”云云，说明不少人在作抄袭勾当，也即不少人在炒冷饭，跟在人们屁股后，扎成堆。扎堆的反面就是开辟了新阵地。祖国数千年文学史，我们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才几年，怎么可能研究透了，无话可说了？持这种观点态度的人，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念头。大家都知道，开辟新的研究园地与农民的垦荒一样，头几年不会有好收成。生土慢慢便成熟土，庄稼才能茁壮成长。所以有些人不愿开辟文学的新园地。这种情况在辞赋研究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辞赋研究比诗词曲小说晚数十年，建国后三十年内没有一篇比较全面研究辞赋的论文，更谈不上为之作史。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短短的十年间，已有数部有关汉赋的专著问世，论文更多。所以，我主办首届国际辞赋

研讨会时，在通知中提出，希望与会者多提交魏晋以后的辞赋论文。我自己也做魏晋南北朝赋风转变的文章，随后又写了几篇论竹林七贤的辞赋论文。我也要求我的博士生们做魏晋以后的辞赋论文。从现在来看，已获得不少成果，就我的学生方面说，有的评魏晋南北朝辞赋，有的论唐代辞赋……刘培同志做宋以后辞赋研究。

宋代是一个学术发达、文化昌明的时代。在古代，辞赋的发达与否与当道者对学术的重视程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宋代的崇文政治促进了学术的发达，也推动了辞赋创作的繁荣，加之宋代由于在大部分时间里实行科举试赋，辞赋在文人的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它与文坛风尚、政治动向、文学群体的活动等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粗略统计，宋代留存于世的赋作当有五六千篇，南北宋各占一半。北宋时期，文人们通过对传统文体的突破以开拓文学新路，所谓“破体为文”，在这种风气之下，辞赋与其他文体的交互渗透非常深刻，这为形成宋代特色的辞赋提供了内在的动因。可以说，无论是在创造数量、质量还是在当时文坛的地位而言，辞赋都是宋代文学当中的大宗。

学者们对宋赋的评价颇受元代祝尧的影响。元代有一段时间科举试古赋。因之，赋坛推崇汉赋。其实，宋代辞赋能在汉魏六朝辞赋和唐代辞赋之后别开生面，创出新体，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些学者囿于祝尧的偏见，漠视宋赋的文化、文学价值，是不足取的。况且，缺少了辞赋的宋代文学史也是不完整的文学史。宋代科考试赋，辞赋在文化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些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在其他文体中反映得可能不明显、不充分，但在辞赋中却能凸显出来。研治宋代文学或辞赋史而不了解宋赋，那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实际上，宋代辞赋自成一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它与其他文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发展深受当时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它的身上，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它也是古典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刘培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宋初中期辞赋研究，约二十多万字；随后他到南京师大读博士后，进一步修订前篇，并续完北宋后期部分，约十五万字，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北宋赋的研究，三十多万字。这当然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专著，对今后中国宋前后的辞赋的研究以及中国辞赋史的撰写，肯定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从总体来说，本书运用实证的方法，爬梳资料，钩沉考订，寻源讨流，考论并重，力求融通文学、史学、哲学，在政治、文化和辞赋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下考察北宋辞赋的演进，尽量准确地描述和阐释其发展的特点和轨迹。本书把北宋辞赋的发展和辞赋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把宋赋各体的发展和辞赋各体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在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宋赋的特征。本书对比回分析了北宋辞赋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以求凸现其不同时期的特征。对于辞赋的特征和赋坛的各种创作倾向、现象，本书结合当时具体的学术思潮、文化政策等因素综合分析，较为全面客观地勾勒出北宋辞赋的嬗变轨迹。

该书对北宋赋和北宋文学的贡献大体上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文学思想的分析，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如该书指出，宋初辞赋呈现出雍容闲雅的治平心态，这是百年太平无事的环境和对文臣的优渥政策涵养出来的一种自足情绪。从宋初开始的崇儒，使文人们也自觉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使命，然而相互掣肘的官僚体制却不能使他们充分施展抱负，只能修己，求得内心的平静。著者围绕这个主题分析宋初辞赋，得出许多较为公允的结论。又如对于文赋的问题特征、形成原因，不少学者做过见仁见智的探索。作者通过排比审察前人成说与考察当时文坛的具体情况和作品，根据古人从题材和体式两个方面确认文体的习惯，否认了那种以为“文赋是先秦汉晋古赋的模仿”的说法，并断言说：“文赋的出现主要是中唐以来散体文风向辞赋渗透的结果”。对古今学者的共识“散体为文、骈散结合是文赋的基本特征”，他又大胆怀疑，以为“这一标准有失宽泛”。鉴于“赋的文体特征往往与表达的内容、风格密切联系”，他认为“从内容上看，北宋的文赋有两种不同的走向”：“一路由宋初议论之文发展而来”，另一路是“以散文语势来抒情写志，抒发深邃的人生感悟”。由此第一次给出了文赋新概念，即：“宋代文赋是以散体语势行文风格，以议论治乱、心性修养和抒发人生感悟为内容的一种赋体。它的语言浅显平易，追求理趣韵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提出了“散体美文化文赋”这一新论断。还有对破体为文的阐释，也比较精彩，对宋代的诗歌散文词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本书结构布局相当合理，作者精心剪裁，布局得当，以时代先后为线索，先综述后分论，然后以类相聚，辨析异同。重点比较突出，条理较为分明。著者尤其擅长辨识赋学风格：各种不同赋体的异同，不同时代同类赋家的异同，同一时代不同赋家的异同，兄弟之间不同性情对赋风的影响

等等，都能条分缕析，定位较为令人信服。其中对宋氏兄弟、刘氏兄弟、新旧党人、苏氏兄弟、北宋理学家辞赋的论述，颇多新见。本书对北宋辞赋的宏观定位是建立在可靠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的，他的细部研究颇多精彩之处。如作者论晏殊赋作，通过“细读”其《中园赋》，指明此赋“描绘了理想的丰腴生活图景”的同时，也揭示了其中所含的“如坐春风般的舒适闲逸的治平心态”；通过详剖其《雪赋》，论定说：“它是作者的意识在自由地流动，是一次审美的心路历程，是闲散的心灵在体认美的艺术境界。”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囿于微观的透视，而是由此来“显微”北宋中期赋作中流露的治平心态。而且在结构布局中也注意到对辞赋创作环境的开掘，这是以前的文学研究者颇为忽视的问题，如对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文化生活关系的讨论，就比较精彩。

第三，本书将学术思潮、文化政策和学术文艺的历史演进结合起来，在这两个维度上考察辞赋，研究思路上有突破。刘培的这种方法在学术界颇为引人注目。这种方法的运用，使许多常人解释不清的观点在这里迎刃而解，如关于屈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等的论述、北宋后期的科举与辞赋、党争与辞赋等，都是很有深度、新意的篇章。

本书出版，我由衷地为刘培感到高兴，也希望他能继续扎实地从事学术研究，并提醒他对宋代文赋应予以一定的关注。对宋文赋更应给予足够的肯定。我认为，文赋可为我们今后创造新赋体提供有益的借鉴。

最后我要说的是，几年来，刘培在全国许多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且多为有感而发，有较高的质量，常为其他刊物所转载，我于2007年在兰州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赋学会上就曾以会长身份公开提出表扬。他是2007年赋学同仁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人之一。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表扬，主要当然希望更多的同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辞赋研究中来。因为与诗词小说等兄弟学会相比，我们学会最年轻，从事研究人员少，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也比兄弟学会少，我们得追上去，把过去被排斥而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每当弟子们新著出版，为他们提笔作序时，我的心头都充溢着莫可名状的欣喜！

2009年4月20日
于山东大学



二

张采民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与诗词、戏曲、小说相比，辞赋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宋代辞赋的研究则更加滞后。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为什么没能引起后人足够的关注呢？究其原因，其一是难度大，需要有很高的学养。铺张扬厉、务博求僻、骈俪对偶、使事用典是赋的体性特征。而这种才学化的特征到了宋代，更是达到了极致。那些散体大赋，都是鸿篇巨制，动辄数千言，甚至上万言，若一字一句笺释全文，费时费力，读懂已属不易，治学就更是难上加难。其二是从阅读心理的角度来说，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赋体文学没有多少优势。它既不像诗词那样意境醇美，语言流丽，令人赏心悦目；也不似戏曲、小说那样情节曲折，形象生动，能够吸引读者；因此受众相对较少，不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三是宋赋研究还是一片未经过大规模开垦的处女地，更谈不上精耕细作了，因此没有多少积累；文献的搜集、甄别、整理，需要白手起家；可资借鉴的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多少。刘培致力于宋代辞赋的研究，可以说是知难而上，由此可以看出他可贵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辞赋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不仅具有体物叙事、抒情写志的强大功能，而且与政治、文化及文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赋写得好，就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获得官职，汉代的司马相如、枚皋就是典型的例子。赋写得好，还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声誉，晋代的左思因《三都赋》而誉满京师，以至于洛阳纸贵，成为文坛佳话。这就大大地激发了文人创作辞赋的热情。汉代不用说，即便是六朝时期，辞赋的数量也可以与诗文比肩。唐宋时期以诗赋取士，对文人的影响甚巨，因而文人更是趋之若鹜，热衷于

辞赋创作。《全唐文》中，赋就占了近三分之一，仅北宋留存于世的辞赋就有三千余篇。宋代辞赋在汉唐辞赋之后，别开生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是辞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代辞赋的发展深受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仅是北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北宋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些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在其他文体中反映得可能不明显，但在辞赋中却能凸显出来。因此，缺少了辞赋的中国文学史是不完整的，研治宋代文学而缺少了宋代辞赋研究，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从辞赋断代史的当代研究状况来看，《北宋辞赋研究》是继龚克昌《汉赋研究》、程章灿《魏晋六朝辞赋史》之后又一部力作。马积高的《赋史》，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词赋发展史》等各种韵文史、散文史或文学史著作，虽然对北宋辞赋有或详或简的论述，但由于是对辞赋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因此往往是宏观描述有余而微观透视不足。即使有微观透视，也多局限于宋代辞赋大家，对一般的辞赋作者很少涉及。《北宋辞赋研究》作为第一部北宋辞赋发展史，改变了宋代辞赋研究史中重“大”略“小”、忽视其“原生态”描述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课题的研究是辞赋研究、宋代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具有原创性的价值。

《北宋辞赋研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作者在谋篇布局上苦下功夫，以时间为线索，举证丰富、考察严谨、论证系统，在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北宋辞赋的特征和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著者尤其擅长在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下，深入考察北宋辞赋嬗变的轨迹及其促成这种嬗变的各种因素，着重研究文人的创作心态、审美风尚、学术思潮等对辞赋发展的影响。《北宋辞赋研究》所用的资料大多是首先发现并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对北宋辞赋发展中的一些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新见迭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新一代的辞赋研究专家，刘培具备了从事学术研究必备的素质。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敏锐，有勇于创新的胆识。因此《北宋辞赋研究》创获甚多，其主要特点略举数端如下：

一是善于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对北宋辞赋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消亡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都与其他事物有着内在的联系。著者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坛风尚等诸多因素与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在纵横两个维度上考察辞赋的发展演变。通过沉潜内省的时代精神



与辞赋的审美趋向、儒学复兴与辞赋创作的价值取向、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等论述，对辞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和探讨。

二是关注北宋辞赋创作中出现的新因素。

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作品数量的多少，甚至主要的也不是作品质量的高低，而是要关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因素、新特点，或者说有没有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著者着力挖掘北宋辞赋创作中的新因素，揭示出其对辞赋发展的意义。北宋辞赋创作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力求新变，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如重学风气使宋初辞赋由浅丽流畅向典雅博奥的转变、辞赋中太平气象的流风余韵、北宋中期以后辞赋向重实用性和重文学性的方面发展、文体的相互渗透及辞赋的散文化与诗词的赋化，文赋的出现及其文体特征、辞赋功能的进一步拓展等。在论具体作家时，也能抓住其新变化，如论田锡辞赋创作的新变、论欧阳修对赋境赋艺的开拓等。这些见解在辞赋史研究中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是擅长对北宋辞赋家的不同风格进行归纳与阐释。

对文学风格的归纳与阐释，是文学本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著者深入考察、研究了北宋时期诸位词赋家及其作品，对其不同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辨别和准确的归类，显示出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文学感悟力。

四是注重对北宋辞赋整体性的把握。

文学史研究当然要重视整体性的把握，一般的文学通史或文体通史，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内容繁富复杂，因此只能重“大”放“小”；但文学史并非只是大作家的历史，而是所有作家的历史。断代文体史则可以避免这种局限，故《北宋辞赋研究》发掘了一批一向为人忽略的辞赋家，这包括文名不著的小作家，也包括不以赋显的大作家。前者如宋初的王曾、朱昂、释智圆、赵湘等，宋中期的王令、郭祥正、刘敞、刘攽、蒋堂等，对他们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其中对郭祥正“骚体赋”的讨论，还可为解读莫砺锋教授提出的北宋诗坛上的“郭祥正现象”（当时诗多名大，后世地位却不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后者如王禹偁、晏殊、宋祁、梅尧臣、范仲淹、王安石等作家，或以诗著，或以词显，他们的赋作却少有人论及，著者则用了不少篇幅对他们的辞赋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有利于窥见他们文学创作的“全貌”，也对准确地把握北宋辞赋创作的整体风貌不无裨益。

五是揭示文人的创作心态。

文学，说到底就是人学，因此研究文学应重视研究作家的心态。著者善于从文化层面来揭示辞赋作者的创作心态。如其论晏殊、夏竦、二宋等人赋作中的治平心态，论郭祥正抓住了其“仕与隐的矛盾心理”，论刘敞、刘攽兄弟则抓住其学人之赋心等。著者还善于从政治的视角来揭示辞赋作者的创作心态。如熙宁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心态，促使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时代特征等。从作者创作心态的角度来解释辞赋创作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致使许多常人解释不清的问题在这里迎刃而解。

总之，这是一部有着很高的学术含量的赋学专著，它填补了断代赋史的空白，是北宋辞赋研究的新突破。

刘培2002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我是他的联系导师。他为人朴实持重，最大的特点是痴迷学术，用心专一。做学问要专注，心无旁骛，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则难有大成。刘培孜孜矻矻，十余年来始终在辞赋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在新一代辞赋研究专家中，已是领军人物。这部赋学研究专著能达到这样高的学术水准，是顺理成章的事，作为他的联系导师，着实为他高兴。当然，这部书涉及的还只是北宋辞赋的部分，他正在从事南宋辞赋的研究，希望很快能看到他的辞赋研究的新成果。这部书是他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充实、加工而成的，故此在付梓之际，说了以上这些话，聊以为序。

2009年4月25日

于心远斋



论

宋代是一个学术发达、文化昌明的时代。宋代文学别开生面，与辉煌的唐代文学并峙。在辞赋方面，宋人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赋坛与唐人争雄。北宋辞赋的发展是承接五代贫弱柔靡的赋风而发展起来并形成自己特色的。由于北宋绝大部分时间诗赋取士，因此，辞赋在北宋文坛上的地位相当尊崇，它与学术思潮和政治动向的联系也极其紧密。根据北宋辞赋演进的实际情况，其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是指从宋太祖开国到仁宗明道年间，共约七十余年。这一时期宋室积极进行学术文化建设，文治的局面逐渐形成，辞赋创作逐步摆脱晚唐五代习气，初步显示出一些自己的特色；中期是指从明道年间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共约四十余年，这个时期是确立宋代文学地位的重要时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辞赋创作十分繁荣，并且在初期辞赋创作探索求新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从熙宁以后到南渡之前为后期，这个时期辞赋众体并作，且由抒发济世热情转向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探讨，悲凉之气渐浓。靖康元年（1126），金人渡河，二帝入北，北宋灭亡，文学思想也转向一个新阶段。我们所指的北宋后期即从元丰年间至宣和年间，共五十年左右。

在宋初，文学活动不太活跃，辞赋创作较为消沉。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事类赋》外，目前仅存赋80余篇，其中律赋30多篇。北宋中期辞赋创作诸体并作，十分繁荣。在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留存于现在的辞赋就有350篇，其中律赋160篇。北宋后期辞赋在苏轼等人的带动下，创作继续繁荣。不过，由于熙宁新政期间科场的变故和策论在科举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绍述期间对“元祐学术”的打压，辞赋创作的势头受到遏制，现存北宋后期辞赋有300余篇，多是苏轼周围的文人创作。这些赋中，骚体约占三分之一以上，歌功颂德的大赋则非常少见。

辞赋各体在北宋的发展互有兴衰消长。

先看逞辞之赋。我们将这类赋分为颂美讽喻赋和抒情言志赋两大类。颂美讽喻赋在立国之初创作不多，且以讽喻治乱为主，如梁周翰的《五凤楼赋》、张咏的《声赋》、夏侯嘉正的《洞庭赋》等均以畅言治道见长；即使颂美的内容也不是谀词满纸，而是描写太平气象、朝廷典礼，委婉地颂扬。真宗以后，颂美赋的创作逐渐繁荣，在天圣、明道年间出现了一个高潮。对王朝的赞美由含蓄走向直露，其内容有描写典礼、祥瑞、宫苑和直接描写当道者几个方面。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文人们参政意识增强，颂美赋趋向沉寂，描写典礼、宫观的赋转向铺叙典礼的过程，宫观的建筑形势、气氛等；而讽喻现实政治的辞赋却兴盛起来，有的继承宋初的传统，议论治道，有的针对具体的现实政治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李觏的《长江赋》、崔伯易的《太行山赋》等几乎与政治论文类似。

抒情言志内容的赋主要围绕自身遭际和表现人格理想两个主题展开。五代以来扰攘的形势和宋初即露端倪的结党纷争促使当时文人重视自我生命价值的独立性，世路沧桑使他们因无法把握命运而流露出无奈和辛酸。徐铉、王曾等人的赋均以表现人世的沧桑和人生如寄的内容见长。儒学复兴，五代以来浮薄的士风受到批判，以儒学道德准则来抨击士风的辞赋便出现了。天圣、明道年间，朝廷大肆渲染太平气象，文人们以辞赋来展现处身治世的闲雅情怀，晏殊、夏竦、文彦博是这方面的代表赋家；之后继起的宋庠、宋祁则表现处身治世的苦闷、无奈和旖旎的情致，治世情怀的描写更为细致、深刻。随着政治革新运动兴起，辞赋中展现淑世情怀的内容多了起来，像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赋》、蒋堂的《北池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梅尧臣等人的一些赋表现有志难酬的苦闷，同样是淑世精神的反映。随着政治革新的失败，表现对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宁静淡泊的情怀成了抒情言志赋的重要内容。

宋初以来说理的成分不断向辞赋渗透，说理赋在北宋有长足的发展。宋初太宗的《佛赋》、《逍遥赋》议论佛、道之旨归；赵湘的《正性赋》纯以议论儒家心性修养行文，类同议论文；王禹偁的一些赋体文也是说理性质。中期以后，说理赋主要议论儒学、理学的内容，尤其是理学家的一些辞赋，形同押韵的论说文。说理赋的发达，反映了宋代学术与文学的紧密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说理赋是从宣扬宗教的辞赋发展来的，和下面我们要谈



的“文赋”的议论化不太相同，说理赋偏重于宣扬一种信仰和思想，和文赋的追求理趣还是有区别的。

文赋是北宋时期定型的赋体，元代的祝尧最先以“文赋”来指代宋代出现的散文化辞赋。其实，有意追求辞赋语言散体化的风尚从中晚唐就开始了。北宋的文赋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路由宋初的议论之文发展而来。随着儒学复兴、理学的兴起，论说文大行于世。在这种散文风气的推动下，一些辞赋突破故有的美学特质，只求说理达意，疏略文采。邵雍创作的《洛阳怀古赋》标志着议论治乱、心性的文赋的成熟。另一路以抒发个人的情态意绪为主，以散文语势来抒情写志、抒发深邃的人生感悟，其确立的标志是欧阳修于嘉祐四年创作的《秋声赋》。在北宋时期可以称得上“文赋”的赋作并不多，但是，辞赋语言的进一步散体化、辞赋审美偏重理趣韵致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骚体在宋初的创作相当寂寞，因为骚体以抒发悲情为主，这与宋初文人内敛的心态不相适应。见于文献最早的骚体是朱昂的《隋河辞》，目前留存最早的是他的《广闲情赋》。这篇赋借男女之情写忠君之思，继承了屈骚男女比君臣的传统。杨亿的《君可思赋》也是一篇抒发忠愤的优秀骚体。诗文革新运动中，骚体因经世致用思潮的激发而勃兴，梅尧臣创作过几篇拟骚之作，蔡襄、王令、郑獬、范纯仁、沈括等人均以骚体来表达忠君报国之思，格调悲凉沉郁。其中，王令是继承屈骚传统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与此同时，以骚体形式写成的哀辞也大量出现，蔡襄、欧阳修等人将哀悼之思与个人的遭际结合起来，与屈骚同调。随着政治热情的减退，骚体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转向描写远离世俗喧嚣的宁静雅致的心境，欧阳修的《醉翁吟》是标志骚体辞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品，文同的骚体在表现怡情雅趣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骚体也受到当时学术思想的影响，刘敞、刘攽的骚体以抒情为主而更具有哲理内涵；王回、张载等人的骚体则类似哲理性的韵文。北宋后期，辞赋进一步向抒情化发展，骚体颇受文人青睐，苏轼周围的文人创作了相当多的骚体，其中尤以晁补之最为突出。

宋承唐制，科举试赋。律赋其实是限制更为严格的骈赋。宋初试赋即重学殖修养，表现出与唐律重描摹精工、音节浏亮不同的趋向。宋初试赋赋题多出儒家典籍，以议论性的题目为主，律赋遂向议论文靠近。真宗以来，科考中策论的地位不断上升，这更加深了律赋议论化的程度。庆历年间先策论

而后诗赋，熙宁年间王安石曾一度罢诗赋，这使得律赋从内容到文势均深染古文习气。范仲淹的律赋文辞雅健，音节铿锵，受唐人陆贽影响甚深。至欧阳修等人，律赋离唐人规矩越来越远。律赋在宋初创作十分兴盛，除科考外，官员的铨选、升迁有时也要试赋。现今留存的宋人律赋相当多，但从艺术价值上来说，总体水平不及唐律，内容充斥着儒家说教，形式上由于限韵过于严格，流于呆板局促，语言因古文的影响而朴讷无文。宋代除律赋外的骈赋创作比较萧条，不过也产生了一些上乘之作，如蔡襄的《士伸已赋》，欧阳修的《黄杨树子赋》、《莲赋》，郑伯玉的《钓台赋》等均语言质朴传神，情韵盎然。北宋后期，辞赋在科场的地位下降，律赋创作明显减少。

从总体风貌来看，北宋赋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一、富于哲思，长于议论

辞赋本来就有议论一体，像荀卿赋，六朝的阐发玄理、佛理的赋都以议论见长。汉大赋的曲终奏雅部分也时有议论。中唐以来，辞赋表现出散文化的趋势。入宋以后，复兴儒学，文学接续中唐学术余绪，论说文创作繁荣，辞赋也表现出重议论的倾向。宋初的一些大赋将铺排部分压缩而扩大议论治乱的曲终奏雅部分，有极浓厚的说教意味。当时还有以说理为主的赋，铺排描写部分退居次要位置，而议论说理成了文章的主体，像张咏的《声赋》、王禹偁的《吊税人场文》就很具有代表性。宋初的抒情、咏物赋往往将个人的人生感慨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借以化解、升华个人情绪，也呈现出议论化的倾向，如王禹偁的《红梅花赋》、《花权赋》，田锡的《筹奁赋》均以洞悉人生的哲思见长。天圣、明道年间，承平的环境使文人们有充足的余暇来玩味人生，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在赋中也往往通过议论来表现，如宋庠的《幽窗赋》、宋祁的《古瓦砚赋》等。诗文革新运动中，辞赋与现实政治充分结合，被用来议论时政，讽刺时弊，陈述政治主张。随着党争加剧，变法失败，文人们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用辞赋来阐发对出处去就的深刻哲思，刘敞、刘攽、王安石的骚体将个人的感触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极富哲理性。一些儒家、理学家则把辞赋当做议论心性的工具，如王回、邵雍等。

宋赋这一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辞赋与儒学具有亲缘关



系，宋代的儒学、理学兴盛，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对辞赋创作有深刻影响，辞赋因而担负起论说文的职能；第二，科考渐重策论，律赋赋题多出经籍，促使律赋走上议论化的道路，在它的带动下，辞赋表现出议论化的倾向；第三，宋代文人集学者、文人、政治家于一身，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对辞赋产生深刻影响；第四，宋人在文学上积极创新，破体为文，有意识地打破赋体特征，使其融入论说文的成分；第五，宋代是文臣政治，宋人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谠言直议的议论精神，并深深渗透于文学当中，辞赋当然也不例外。

二、旨深趣远，情理兼得

宋初辞赋表现出沉潜内转的抒情特征，一些赋家不愿涉足重大现实问题，对自身际遇表现出过多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深幽的内心世界来体会漂泊于人世间的种种感受。当时的辞赋情感趋向于宁静和平，往往通过理性的思索来化解个人的愁怀。虽然有些赋家有意识地学习汉晋赋艺，但他们的铺排夸张相当克制，以与宁静平和的心理相适应。天圣、明道间的赋家善于表现治平心态，具有雍容闲雅的特征。他们充分展示了处身太平的细腻、深婉的心理，即使像宋祁那样故作悲声，也常以理性的思索来排遣个人愁绪。政治革新运动兴起，文人们经世致用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屈骚传统得以张扬，辞赋风格多豪雄之气，但忠愤之情与儒学道德人格完善结合在一起，激越的情绪为理性所节制，忠愤之情为皈依道德完善的人生理想所化解，归于平静。随着政治革新失败，辞赋趋向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栖隐情趣的高妙，襟胸澄澈而妙解天人。总之，情理相融，含蓄隽永，玄通万物，是宋代辞赋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宋赋这个特征的形成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宋朝国力衰弱，文人们普遍缺乏纵横天下的自信心，心态向内收敛，追求宁静和平的精神世界，因而，辞赋中便表现出以理节情、融情人理的特点；其次，宋代儒学、理学均强调心性修养，主张内省，宋人重视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往往借辞赋来表现心灵的升华和彻悟；再次，宋代学者儒、道、释兼通，他们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又把超功利的审美活动视为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他们神往澄怀观物、胸怀清旷的人生境界，尤其是在政治上受到挫折

以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宋赋因之呈现出妙解天人、平淡清远的理趣韵致。

三、众体兼备，平易畅达

如上所述，各种赋体在宋代几乎均有创作。在众体并作的同时，赋家们还追求平易畅达的文风。辞赋以逞辞见长，这一传统在宋代被漠视。散体文的语言风格深深影响着辞赋，即使骈赋、律赋，也由整丽典雅走向条达辞畅。最能体现北宋辞赋流畅特征的是文赋的出现。辞赋的这一特征主要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第一，宋代科举更为广泛，宋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辞赋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因而，他们创作如律赋、典礼赋等各种赋体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二，宋人学识渊博，特别重视多读书而自成一家，各种赋体均可熟练驾驭。于唐人之后别开生面的努力也使他们在熟习各种赋体的基础上力求突破。第三，宋人重学而强调学力胸襟，以才运学。他们关注的不是文辞上的典雅，而是学识上的融通，他们不需要以繁词来文饰智力的肤浅，而是要以简洁之词表达深刻的哲思，因而，在辞赋中，他们常以平易畅达的文辞表达深刻的理致。第四，宋代文坛尚破体为文，破体的目的是为了别立门户。辞赋逞辞的传统被扬弃了，散体文风随议论化风气渗透于其他文体当中，辞赋也深染此风。